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ZOSHUI WAIGUO WENHUA MINGREN SHU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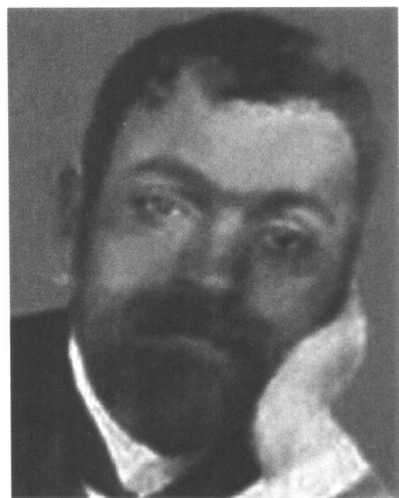
舍斯托夫集

SHESITUOFU JI

悲剧哲学家的 旷野呼告

人得到信仰不是为了维护理性对宇宙的统治，而是为了使人自己成为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主人。

上海遠東出版社



舍斯托夫集

— SHESITUOFU JI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舍斯托夫集

编 选/方 珊

责任编辑/殷卫星

装帧设计/范峤青

责任制作/晏恒全

责任校对/周国信

出 版/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430 千字

印 张/17

插 页/4

ISBN7 - 80661 - 991 - 7

C · 34 定价:29.80 元

20SHIJI WAIGUO WENHUA MINGREN SHUKU
SHESTUOFU

人得到信仰不是为了维护理性对宇宙的统治，而是为了使人们自己成为上帝创造的世界的主人。

出版说明

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需要回顾和检审。这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而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代西学所获得的相当程度积累则使这种回顾和检审成为可能。于是,我们组织学界人士翻译、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文化名人”,仅是一个因俗的称法,人物之入选以学术价值为重,至于每种人物专集之选文,都旨在真实反映该人物的思想特征和学术见解的原貌,供读者面对其人其文,分析、研究、借鉴、批评。

立志固高,行有未至,我们热诚期待学界的促进。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总序

季羨林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订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帐，目的都在回顾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

科学技术的惊人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工具方面的突飞猛进,用一些人使用的形象的说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产生“蝴蝶效应”等等的理论,决不是偶然的。已覆的前车历历可数。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和一些有识之士高呼“环保”,其声震天动地。这决不是没有根据的,这也让我们这些忧天的杞人感到点安慰。然而,就我个人浅见所及,高呼“环保”而不从事实的发展中,特别是从思想的高度和哲学的高度上,来探索环境之所以必须保护,环保工作之所以是火烧眉毛的紧迫工作的根本原因,这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实在为愚陋如不佞者所难以理解。

总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纪末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末。

我在本文一开头就谈到,到了一定的时候,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就应该回头看一看,看一看在过去一段行程中车行和车覆的经验和教训,以决定今后的走法。现在正是这样的的时候了。而且,我认为,应该回头看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世界。

正在这样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关键时刻,上海远东出版社不惜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实在是顺乎潮流,应乎人心的壮举,我想,谁也不会吝惜对此举的赞誉。出版社提出的方针,虽然重点是放在人文精神上;然而,大家都会理解,人文精神是指导人类社会前进的关键精神,它是龙头,它同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抓住人文精神这一条纲,则纲举而目张,提要而勾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打算。

为什么单单举出“外国文化名人”呢?中国《诗经》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富有哲理而又明了形象的话,千百年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远东出版社之所以选外国名人,我想其故就在这里。

对于入选的这几十位“名人”中的某一些人,中国学术界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足为怪,不这样才是怪事。但是,我相信,对绝大多数的入选者来说,大家都会同意的。这些名人,时代有先后,治学有专精,影响有大小,造诣有高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十二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慄觳觫。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蟋蟀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主编开卷语

林贤治

时间的发现与分割,无疑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智慧之一。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必然穿透个人而接连更多同类,抵达辽阔的界域,承载且激荡着丰富的内容。世纪令人怀想全人类。时间与空间有一种庄严的对称。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20世纪的入海口。

远溯世纪的源头,便见绝壁重渊,狂流乱注。两次世界大战,漫过短暂的空隙地,蜿蜒至半个世纪;虽然最终为人类意志所遏止,留下的废墟毕竟是巨大的。奥斯威辛至今不长青草。19世纪,共产主义幽灵犹在西欧徘徊,这时屹立东方,热烈而坚定,恰如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美乐尔”;为十月革命犁耕的土地,崛起苏维埃政权,继而又红了欧亚一大片,甚至点染了美洲一角。30年代经济大危机过后,几十年间,不复发生如此惊悚的故事。“看不见的手”在加紧运作。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仿佛已经穿越有关垂死的预言,平稳进入卡恩所称的“大过渡”。及至80年代末,苏联东欧遽然发生戏剧性演变,致使那些历史的过客在柏林墙的坍塌声中纷纷谢幕。所有这一切,其实仍然不能称作“意识形态的终结”。社会主义以其固有的力量,使东方一个传统深厚的民族,在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保持独特的面貌。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 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 至 60 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 至 70 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 至 90 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时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 20 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有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僵死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自明与信仰(代序)

——纪念舍斯托夫逝世 60 周年

方 珊

渴求普遍和必然的真理的理性引向死亡,而生命之路要通过信仰。

舍斯托夫

在 20 世纪璀璨闪烁的思想群星中,列夫·舍斯托夫(Лев Шестов, 1866—1938)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是一颗极为耀眼的明星。他大胆质疑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尊崇理性的传统,标举信仰为其思想旗帜,重视个体的人,关注个人苦难与绝望,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即便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看来,仍极具挑战性。

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发展出一种崇尚理性的思想传统,苏格拉底为了追求理性真理而选择死亡,柏拉图把哲学家尊奉为理想国的君主。即使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很多人也是非常思辨、非常逻辑地讨论神学问题。到了近代,康德通过区分“自在之物”和“自为之物”把“理性”从上帝手中夺回,重新给予人认识理性真理的权利。黑格尔则把康德哲学推向极端,建构了他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的王国。崇尚理性的哲学传统到了 20 世纪有增无减。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就认为:哪怕世界毁灭

了,理性的法则依然存在。

但是舍斯托夫却发出“旷野的呼告”。他认为,与古希腊的理性传统相对照,西方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它以《圣经》思想为代表,在近代由尼采、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继承。它们都拒绝理性的绝对统治,认为理性无法解决生死问题,无法解决人类的恐惧、绝望、堕落等问题。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和理性相比,信仰才是人更深层次的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舍斯托夫哲学中的“圣经”、“上帝”概念,并不等于神学家思想中的“上帝”。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和迷信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正如他对别尔嘉耶夫说的:“你把思想神化,而我恰恰最受不了思想的神化。”他在哲学中坚持信仰,坚持对真理的绝对性的怀疑,提倡思想的自由,实质上是在理性的力量借助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而越来越统制人的思想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正如他在纪念哲学家胡塞尔的文章中说的:“迫使我在没有人认为尽一切力量可能有胜利希望的地方开始进行斗争。”^①

二

舍斯托夫原名列夫·伊萨科维奇·什瓦尔茨曼(Лев Исакович Шварцман),1866年生于乌克兰基辅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虽出身贫寒,但后来逐渐成为当地富商。舍斯托夫在基辅受启蒙教育,后被送到莫斯科上中学。1884年,舍斯托夫入莫斯科大学,开始就读数理系,后转读法律系。大学毕业后,曾服兵役,担任过短期的律师助手,并在其父的企业工作,发表了几篇有关财经方面的文章。

1894年,他转而研究文学与哲学问题,次年,相继发表了几篇文学与哲学论文,满怀兴趣地研究莎士比亚、勃兰克斯、康德、

^① 参见舍斯托夫:《纪念伟大的哲学家爱德曼·胡塞尔》,《哲学译丛》,1963年第10期,第62页。

尼采、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著作。1898年,其处女作《莎士比亚和他的批评家勃兰兑斯》一书问世,使之在文艺批评界崭露头角。1899年,《托尔斯泰伯爵与弗·尼采学说中的善》出版。随之,《悲剧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于1903年问世,不仅在俄国学术界,而且在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以后,《无根据颂》(1905)与评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尔嘉耶夫等人的结集《开端与终结》(1908)出版,又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舍斯托夫在莫斯科经历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后,曾回到基辅,并在基辅人民大学讲授古代哲学史教程。1920年,他举家迁居巴黎,开始了长达18年的流亡生涯。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由流亡教授组成的“俄罗斯学院团体”,兼任巴黎大学斯拉夫大学研究所俄罗斯历史语言学系教师,并在索邦大学讲授俄罗斯与欧洲哲学思想史等课程,相继出版了《钥匙的统治》(1923)、《在约伯的天平上》(1929)等著作。

他与俄国、法国和德国等著名哲学家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可夫、胡塞尔和舍勒等交往密切,尽管彼此学术观点不同,但交情甚深。晚年他仍笔耕不辍,著有《雅典与耶路撒冷》、《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思辨与启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其独特的方式,鲜明地突出思辨与启示、理性与信仰、自明与上帝间的对立,终其一生他都在向上帝呼告:

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 地狱啊,你的胜利在哪里?

三

由理性走向信仰,由自明走向启示,由雅典迈向耶路撒冷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坎坷和险象环生的道路,其中有眼泪、诅咒、悲哀,更有苦役和绝望的深渊。尽管这条路漫无尽头,但仍然吸引着为数不少的思想家去尝试跋涉。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只有

那些始终坚持信仰的人，才有可能摆脱一切束缚，采摘到生命之果，而这样的人却屈指可数。

舍斯托夫就是这样一位抱着真挚信仰的思想家。值得注意的是，他追寻上帝的漫长之路并非始于神学，而是始于文艺批评。他曾向往当作家，写过一些习作，但并不成功。他还萌发过当歌唱家的想法，但遗憾的是，他的嗓子被音乐教师教坏了。在大学时期，他曾是一名热心研究工人运动的青年，写过一些有关经济学的论文，但被否决了。尽管这些梦想都破灭了，然而，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人的个体存在境况却深深地吸引着他，对人生问题的敏感唤起了他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沉思。

兴许还是过去的文学情结在起作用，他的启蒙老师竟是莎士比亚。舍斯托夫也曾就人生问题向康德请教，遗憾的是，康德哲学未能满足他对人生的深思。他进而想到，为什么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对人的个体存在视而不见，而对所谓规律、法则、原理却津津乐道呢？难道知识是绝对有效的，我们必然向它顶礼膜拜、奉献一切，哪怕是我们认为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包括生命都要甘作祭品？这里面是否有值得追问的东西？

当哲学家们的大部头著作仍使舍斯托夫百思不得其解、疑窦丛生之时，一些文学家的作品却深获其心。莎士比亚那谜语般的诗句“这时代是纷乱无绪的”强烈地震撼了他，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曾鲜明地提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关键问题：“是生还是死？”这恐怕是每一个人都应面对的重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它，然而，哲学家们不仅没有去面对它，反而掩盖它。

在他看来，莎士比亚是西方近代以来最为尖锐、最为鲜明地提出人的存在问题的作家。莎翁通过其许多优秀作品已经向世人宣告，过去的一切尽管为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然而却正在走向破灭。当人的存在露出其可怕的面貌时，人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要么走向死亡，要么就立刻去寻找一种新的信仰，否则，人该怎么办？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一剧中告诉我们，不是凯撒，而是杀死凯撒的凶手勃鲁托斯崇信道德是全权与万能的，并教人